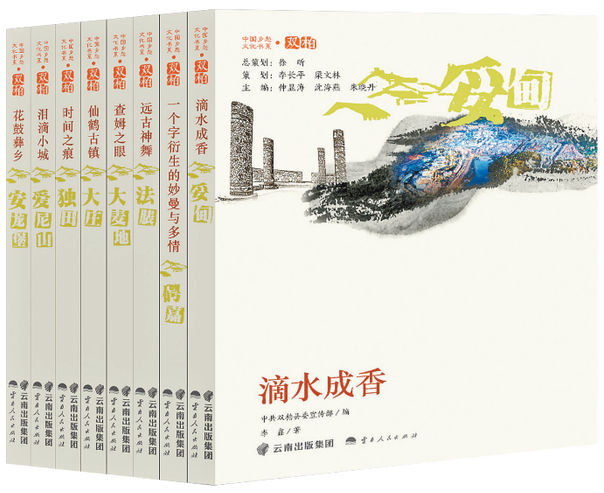
书香云南

以文化乡愁重塑民族文化自信

——写在“中国乡愁文化书系·双柏”出版之际

徐 昕



在中国的行政区划中，乡镇是最基层的行政单位，是组成国家的主要元素之一。乡镇的发展，乡镇文化的繁荣与传承，关乎每一个人的福祉。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乡镇数量众多，分布较广，也正因为如此，在文化层面，更多的人们未能走近乡镇文化的内核中。然而，乡镇却是人间烟火的最深处，也是最值得人们抒写和品读的文化历史中心。

双柏是一个秀美之地，是一个孕育深厚文化的秘境。双柏县辖5镇3乡、84个村委会、1540个村民小组、1845个自然村，总面积4045平方公里。县内无一平方公里完整的平坝，山区面积占国土面积的99.7%。境内居住着汉、彝、回、苗、哈尼等18种民族。2012年双柏县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彝族文化之乡”。

文化丛书“中国乡愁文化书系·双柏”（8卷）是以乡镇为单位，从更小的行政地理，努力地去发现、挖掘那些被遮蔽的人文、历史、风情……通过作家的实地采风、创作，较为全面地再现双柏县的整体文化，填充乡镇文化的“空白”；用新的笔法和新的抒写方式，重新发现或创造一个属于这个县的新的文化符号，帮助人们重新认识双柏历史、文化的多样性，从而发现这片土地的独特魅力。该丛书的8本分册是关于双柏人文历史、物产资源、风土人情等方面的细密梳理，是关于双柏文化的吟诵和传颂，是阅读双柏、体验双柏、品味双柏、提升双柏的有力的文化举措——

《滴水成香——妥甸》（李鑫著）文字云卷云舒，作家抚摸着妥甸这块土地的时光页面，细数人文的印痕，将那些历史的回声重新传递，并尽可能地印证那段史实的部分真相；在爱尼山，那些温暖的瞬间被永恒地传颂。苏友仁在他的《泪滴小城——爱尼山》中这样写道：“那朵盛开在枕边的富贵牡丹，火一样鲜艳，母亲一针一线绣的，算是给我唯一的嫁妆，每次抚摸，都像抚着母亲的手；每次醒来，都泪湿牡丹。母亲这个远近皆知的绣娘，绣鞋垫能走千山万水，绣裹背能保四季平安，却没法给我绣一段好姻缘……”；《查姆之眼——大麦地》（尤国兴著）则从彝族人的创世史诗《查姆》说开去，让我们看到了绿汁江畔的诗和远方，看到了一眼千年的守望，看到了彝乡深处的古老童话……对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民间艺术、濒临灭绝的文化遗产，做一次最贴近人性的穿越和记录；胡玉双的《时间之痕——独田》由古道开篇，将隐于哀牢山深处的独田作探秘和梳理，在洋溢着激情和怀旧的文字中，作者引领着我们进入了时光的隧道，由此，我们看到了独田最迷人的肌理……尹世全的《远古神舞——法腆》带领我们又一次进入了彝乡深处，享受到了那些美食，重看了“大罗笙”舞。他的文字是忧伤和诗意的融入，是作家个人情感中的悲悯及担当。他的语言给我们以澄明、敞开、本真的韵味；安龙堡是作家姚兴科的故乡，在《花鼓彝乡——安龙堡》开篇中，我们读到了他灵魂的守望，读到了作家的乡愁。顺应他文字的抒写，我们看到了妙曼彝乡山水，看到了作为革命圣地安龙堡的往昔与今朝……诗性的抒写《一个字衍生出的妙曼与多情——鄂嘉》（董树平著）让我们认识和走近了妙曼多情的鄂嘉：鄂嘉的土地有纯净甘冽的山泉，胸襟开阔，涤荡魂灵。鄂嘉的哀牢梯田是勾人魂魄的历史文化……在《仙鹤古镇——大庄》（超玉李著）中，对大庄的历史演变进行了抒写，让我们的视线收缩，盯紧了这个没有多少名气的大庄。属于大庄的仙鹤节则给我们带来了视觉上的盛宴……

该丛书的出版是经过了策划，是有创新、有思想内涵和张力的文化作品，它们将双柏的乡愁文化演变得明明白白，有系统性、全面性、针对性。丛书对双柏各个乡镇人文史进行了认真梳理，把人文与自然生动地联系，打通了现实与历史的联系，实现了文化和情感的交融、道德与知识的合拍。丛书将史实、神话、传说、故事融为一体，在散文化叙事的同时，有美学的探究，有哲学的思考，读来饶有兴味。文本具有独具个性的表达，作家的创作情绪没有脱离创作现场，引领和启发读者的思绪和情感在历史和现实间穿越。丛书创作团队成熟，有人文情怀，对双柏的人文史资料有深厚的积累及解读能力，从他们的文字中我们可以走进双柏的乡愁深处，然后驻足、流连、回味、思索。

丛书的创作出版是一次探索，既是探索，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就会有瑕疵，作家艺术家内心想表达的和已表达出来的总有距离。让我们带着雍容之心走进作家们的创作语词中吧，阅读、评说，让今后奉献的阅读文本，更精致，更实用。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那些如繁星一样点缀在祖国广袤土地上的村落、小镇都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特文化内涵，乡愁是对家乡风土人情的追忆，是对家乡文化品格的充分肯定，“中国乡愁文化书系·双柏”为乡愁文化提供了一个好范本。

云岭阅读

文化精准扶贫与地域文学研究新成果

——读《大一这年》

王美春

如何做到精准扶贫？如何深化地域文学研究？如何引导大学生健康成长？诸多问题在云南省昭通市学者刘绍清主编的《大一这年》（团结出版社2019年版）一书中都可以获得参考答案。

《大一这年》是刘绍清主编出版的农村文化扶贫研究著作《中国农村文化扶贫研究》的“姊妹篇”，也是他主编出版的昭通文学发展道路系列研究著作的第五种，此前已经出版了《昭通文学发展道路初探》《中国地方文学发展道路探索》《中国诗散文研究》《中国农村文化扶贫研究》。

作为昭通市纪委扶贫工作队的成员、文化研究学者，刘绍清参与了扶贫实践，并在地域文学研究上下功夫，注重在文化精准扶贫与地域文学研究的结合上做文章，于是有了《大一这年》。此书不仅艺术地书写了昭通精准扶贫之创举，而且突出地展现了地域文学研究的新成果，是一本特色鲜明、价值较高的著作。

《大一这年》在内容上具有独特性。此书一方面将昭通的精准扶贫（文化扶贫等）之创举艺术地书写出来，另一方面将昭通文学研究的新成果突出地展现出来。书写昭通精准扶贫之创举与展现其地域文学研究新成果的内容有机结合，而内容的独特性又决定了此书的价值。当代学者狄其骢曾在《文艺学通论》中对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作了准确而明了的阐述：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是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就内容与形式两者比较而言，内容为主，形式为次，内容对形式起着决定作用。形式不是一种超然独立之物，它是为了适应内容的需要而形成的。”《大一这年》，其内容与形式得到了较好的统一，尤其是内容具有独特性，而且充满了正能量。

《大一这年》在编选上具有创新性。一方面，扶贫者与扶贫对象的作品相结合。此书分为“爱河奔流”“人生风景”“理论思索”“智慧点滴”“乌蒙回音”五部分。收录了直接扶贫者与其他扶贫者的文章；也收录了几位扶贫对象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撰写的纪实文学作品，另有曾历经贫困而在大学毕业之后脱贫者的纪实文学作品；还收录了与精准扶贫（文化扶贫等）相关的理论研究文章，一些作者关于大学生活的建议、思考一类的作品等。扶贫者的作品与扶贫对象的作品相结合，在编选上具有创新性，使此书既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又有一定的广泛性、典型性。另一方面，纪实文学作品与研究文章相结合。纪实文学作品与研究文章编在一起，这是否显得不伦不类？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恰恰是此书编选上的创新之处。常言道：“文无定式”。为文如此，编书亦然。《大一这年》在编选上做到纪实文学作品与研究文章相结合，印证了“文无定式”之说，让感悟与理性相结合，既有较高的情感热度，又有一定的理论深度，也使此书明显有别于其他扶贫类著作或地域文学研究著作。

《大一这年》为精准扶贫提供了成功经验，其所反映的精准扶贫的创举，为其他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提供了值得借鉴、推广的成功经验。扶贫工作要取得理想效果，就得由单一的扶贫者“输血”变为扶贫者“输血”与扶贫对象自我“造血”同步进行，而且以“造血”为主。这就必须做到精准扶贫，不仅要“扶智”，而且要“扶志”等。《大一这年》中一些纪实文学作品的作者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也是精准扶贫（文化扶贫等）受益者的代表，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而此书反映的精准扶贫（文化扶贫等）经验，也能让其他地方借鉴，从而扎实做好精准扶贫工作。

《大一这年》为大学生教育提供了有效途径。书的第二部分“人生风景”，收录的主要是受到文化扶贫资助的几位大学生撰写的记叙自己成长故事的作品。这些作品，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这些大学生的感恩之心、理想抱负、成长蜕变、奋发图强等，为当今的大学对大学生的教育尤其是德育方面提供了有效途径。

《大一这年》也为地域文学研究提供了新样本、新思路。《大一这年》书中的扶贫对象是几位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其文大致可归类于纪实文学作品。其中，叙事往往与抒情相结合，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尽管这几位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所学的并非中文专业，却写出了具有较强文学性的文字。这些文章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此书的文学性。不仅如此，此书中收录的具有一定理论色彩的研究文章，着重揭示了昭通市纪委文化扶贫的经验、特色、价值，探讨了深入开展精准扶贫、文化扶贫、教育扶贫的路径等，是对此书内容的补充、升华。这些研究文章也都属于昭通文学研究的新成果，为地域文学尤其是昭通文学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新思路，给人以启迪。可以预见，此书的出版必将助力昭通乃至其他众多地方的精准扶贫的深入开展与地域文学研究尤其是昭通文学发展道路研究的深入进行。

读书随笔

踏遍南疆写春秋

——《欧之德文集》读后

蒋 涌

作为一个曾经的军旅作家，欧之德的文字底蕴是赤诚与才情。他始终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前途紧密联系，出手皆重大题材和民生民意。《欧之德文集》正具有这样的特点。

欧之德在部队23年，风雨边防、军营号角成就了他曾经倚马作文的铁血纪录。延续至今，无论作人、作文，他坚守军人俯仰无愧怍的精诚，遵循一个终身矢志不渝的文道，置身于时代的敏锐感应与深刻洞察地捕捉之中。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不管在军队还是在地方，他都一如既往不断拿出有分量的著述奉献社会，奉献读者，这是他专属的带有鲜明的笔墨特征和情感烙印。

《欧之德文集》（5卷）收录了他大部分作品，如长篇小说《杨升庵》《罂粟血》，中短篇小说《孔雀湖迷彩》《小院无狼烟》，长篇纪实文学《卢汉起义纪实》《百万川军在云南》，长卷散文《丽江四方街》《云天之外的香格里拉》以及数万字的散文、评论等，凭借自己沉甸甸的的著述，他把古代、近代、当代的“这一个”或“这一群”串接成不同时代人生命运的大起大落或大喜大悲。他站在高处俯瞰战场烽烟、俯瞰史脉人生。他认为，作家的记录就是在春秋轮回中让这些人和事呈现出长盛不衰的生命力，让往事今事构成一串入耳动心的和弦及一段掩卷难忘的故事。

欧之德先后在风云变幻的中缅边境、中老边境、中越边境当兵，在部队他及时写出一篇篇带着硝烟的战地散文、诗歌、报告文学，在《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和地方报刊发表，收入选集中的《边塞的星座》《孔雀湖迷彩》《小院无狼烟》《大军官》等都诞生于军营，其中，散文《在缤纷的红花中》小说《野外的太阳日》获得部队军事题材创作的奖励。

欧之德的长篇纪实文学《卢汉起义纪实》是他耗时4年多的史料收集、遴选、甄别和编纂工作完毕后，用文学形式撰写的一部力作。他懂得：自己的严谨书写，不仅是对一段历史的还原，也是对卢汉和他统领的将士们一番积德的回报，更是对云南百姓一卷文字春秋的立言。凭着对史料的掌握，作家既铺展开幅度阔大的背景场面，又像写小说一样重视细节描写，再现当年卢汉起义剑拔弩张的博弈场景，展示出那一场险象环生的各种政治派别、势力、人物竞相登场角逐的明争暗斗，把一系列人物角色和特定场面描述得真实可信，让读者如身临其境，作品令人爱不释手。《卢汉起义纪实》问世后，初版21000册很快售罄，出版社又再版上万册供应需求。

欧之德转业到地方后创作的26万字的长篇小说《杨升庵》，则是他到地方后自主选题迈向“历史文学”的一次大胆尝试。杨升庵是四川新都人，因得罪明嘉靖皇帝被充军到云南30多年，他一生留下400多部著述，是在边疆传播中原文化的一代鸿儒，是云南地区几乎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

杨升庵是500多年前的历史人物，要再现从繁华的京城到“蛮荒”的云南500年前的情节，要把《明史》对杨升庵只1000多字的记载演绎成20多万字的小说，谈何容易？好在，欧之德熟悉云南，云南民间遍留“杨状元”的故事和遗迹，“杨状元”是云南人心目中的一座丰碑。作家在进行了长期素材搜集和准备后方才动笔，他以优美的文笔，生动地刻划出了一个流星般划空而逝却永垂不朽的历史人物，再现了杨升庵坎坷而辉煌的一生，实则是借助前人的书生意气表现一种人心呼唤的社会正义，文末那道“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苍凉况味，实际上是来自历史深处所蕴藏所讽喻的期冀与遗憾杂拌的啼笑皆非，是一个对儒家推崇的“达则兼济天下，贫则独善其身”高洁品格的苦涩注脚。

欧之德于20世纪90年代写的长篇纪实文学《百万川军在云南》，则是一部关注民生，关注底层人物命运，为艰难求生的打工者呼吁的力作。该书上溯写到历史上的诸葛亮、司马相如、杨升庵以及朱德、艾芜等“川军”“川人”入滇，写到20世纪60年代大批四川“知青”到云南，70年代、80年代初在云南作战的四川籍战斗英雄等，但重头笔墨则是80年代从四川蜂拥而入、号称百万大军的打工仔。该书是全国最早诞生的“打工文学”长篇作品之一，通篇是令社会各界心生恻隐、令打工者动情、动容的“原生态”文笔，它真实再现了大变革时期“从混乱走向新秩序”的历史进程。他的一个个文字叩开了打工者的心扉，让他们热泪盈眶与感激不已。在打工者最多的广东珠江三角洲，当地的《港粤日报》特辟专栏，用近半年的时间，将《百万川军在云南》予以全文连载，影响广泛。

云南是欧之德当兵的地方，更是他生活的地方，云南的奇山异水、大好风光，毫无疑问亦在他的文学视野之中，他的一篇篇优美的散文，几乎都是他走遍云南各地的抒情之作。收入文集的3部长卷散文《丽江四方街》《经典云南》《云天之外的香格里拉》，几乎囊括了云南东西南北的要点风光，尤其是那些人迹罕至尚未“开发”之地；那些边关远哨只有军人出入之地；那些奇风异俗鲜为人知之地……八千里路云和月，他走过、游过，他写过、颂过。

在欧之德的写作履历中，无论军事题材，历史题材，还是当代题材，20余部作品，如20余幅画卷，贯穿于他笔底的执意追求中，始终保持着挺得住岁月侵蚀的本色和真诚。

新书架

20卷《新时期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出版

《新时期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20卷，黄尧、杨红昆主编）日前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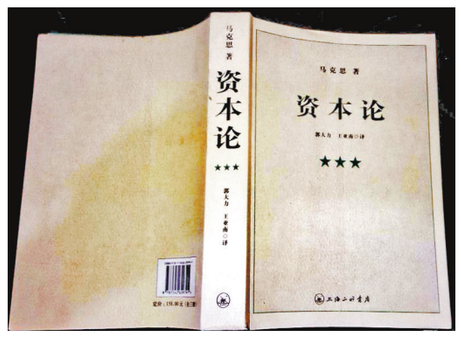
这部作品选收录了布朗族、基诺族、德昂族、独龙族、白族、怒族、佤族、景颇族、普米族、阿昌族、拉祜族、纳西族、傈僳族、傣族、哈尼族15个云南独有民族和彝族、壮族、藏族、回族4个共有民族，计19个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共计735万余字，其中小说195人218篇，散文370人523篇，诗歌285人852首。这套选集，是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新时期云南少数民族文学成果的一次梳理、精选和展示。

郑千山

娜嬛撷珍

用生命书写多项传奇的郑易里

郑千山



郑易里(1906.10-2002.4)原名郑雨笙，曾用名郑重良。1906年10月3日生于云南玉溪上郑井。他父亲郑宝臣由雇农起家，生有7个儿子，郑易里排行第7。郑易里自幼非常聪颖，颇有主见，在放牛、种豆等务农之余就爱上了农学。1920年，郑易里当时在昆明教书的二哥郑一斋把他带到昆明，跟随柏希文补习英语，后进入私立成德中学读书。

郑易里在成德中学读书期间，正是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的时期，年轻的他开始接受新思想的冲击与洗礼。1924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农学院预科，与同乡李鑫同学，在李鑫介绍下，他加入了由中共党员王德三领导的进步团体新滇社，走向革命。抱着“实业救国”的抱负，郑易里1927年东渡日本，到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后改名东京工业大学)纺织系学习，与刘惠之等组织成立新滇社东京分社。1928年为抗议日本制造的济南惨案，他悲愤地回到祖国，在上海参加了反日大同盟。同年他11月他与张天放、艾思奇等回到云南，12月由李梓柏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省委书记王德三的秘书、中共迤南特委委员，在文山、个旧（协助李鑫）一带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1930年8月，由于叛徒出卖，云南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王德三等被杀害。郑易里在友人帮助下，与宣威籍党员浦承绪（由郑易里介绍入党）避居于宣威浦家半年时间，在郑易里影响下，浦承绪的三个妹妹（浦代英、浦石英、浦琼英）后全部奔向了革命圣地延安。基于云南党组织已经无法开展工作，郑易里只好在中共党员唐用九等的帮助下，风餐露宿，步行由昭通进入四川，经由宜宾、重庆、南京水路最后安全抵达上海。

在上海，郑易里继续从事党的工作，他用经商为幌子，经常与艾思奇、黄洛峰、张天虚等聚会，学习和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组织和参加党的地下工作。不久，其二哥郑一斋的婿弟聂守信即聂耳（郑一斋长女郑琼嫁给聂耳三哥聂叙伦，聂耳称郑易里为“七叔”）也来到了上海。郑易里对年轻的聂耳从生活和工作上关怀备至，同时介绍聂耳参加了上海“反帝大同盟”，影响并引领聂耳最终成为了一位优秀的中共党员。

为厘清社会上横行着的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哲学和冒牌“马克思主义哲学”，1933年郑易里与艾思奇开始从苏联大百科全书中合译《辩证唯物论》条目，1936年这些条目以《新哲学大纲》为书名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几年中，郑易里还翻译出版了《资本论的文学结构》《自然辩证法》等马列著作。同年11月，读书生活出版社社长李公朴因“七君子”事件被捕入狱，出版社业务陷入困境，难以维持。郑易里当即挺身而出，从经商成功的二哥那里借了3000银元支持出版社并出任出版社秘密董事，同时，郑易里和艾思奇邀请党员黄洛峰担任出版社经理，使读书生活出版社渡过了难关。

《新哲学大纲》出版后，郑易里便同艾思奇、黄洛峰便立志并着手翻译出版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资本论》的全译本工作。他们商定由懂德语的王亚南、郭大力翻译，郑易里负责筹措出版资金并审校译稿。为了在中国第一次翻译出版《资本论》的全译本，郑易里再次向其二哥郑一斋求助，同情革命的二哥明知此款属有借无还，但还是一口答应，先后拿出了7万银元作为出书经费。1937年8月，《资本论》第一卷刚刚译完，淞沪抗战开始，形势非常危急。读书生活出版社为了保存出版力量，由经理黄洛峰带着出版社青年和大部分家业转移到汉口，艾思奇去了延安，只有大义凛然的郑易里留守在了沦陷的上海，负责出版社上海分社的工作。为了保证《资本论》的翻译出版，负责翻译后两卷的郭大力回到赣州老家继续翻书，郑易里则在社会政治环境和经济状况十分艰难的情况下，维持着分社的正常工作，他一边提防着反动当局的查抄，一边夜以继日对照手中的日文版的《资本论》审校译稿。郭大力译好一部分就寄往上海一部分，郑易里立马及时整理审校这一部分并把稿费寄给译者。为了解决纸型和重要资料的存放问题，郑易里还腾出自家的一间阁楼作出版社的秘密库房使用。

1938年8月和9月，200多万字的《资本论》中文全译本终于在中国问世了。然而，迫于当时上海的形势，《资本论》无法在上海大量印发，郑易里便亲自带着全套纸型，从上海辗转香港到越南海防，又从海防到昆明，再从昆明乘汽车到贵阳，最后由贵阳抵达抗日大后方重庆。当时在重庆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非常关注并亲自过问在重庆印刷《资本论》的经过。不久，延安的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都读到了这部马克思用毕生精力写成的巨著，党员们开始组织学习小组学习《资本论》。《资本论》全译本的出版不仅是我国翻译史和出版史上的光辉一页，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一件大事，这其中，郑易里当记头功。

多年的编译工作使郑易里体会到全社会需要一本适用的英汉词典，1940年代初，郑易里约请曹成修一起合编《英华大词典》。经过近10年的宵衣旰食，他们搜集整理和参阅了不计其数的文献资料，克服了重重困难，于1950年底，一部完备而实用的《英华大词典》终于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名义出版了。这本词典前后印刷了几十次，发行100多万册，哺育了两代新中国的海内外广大英语学子。1985年，经郑易里新修订的《英华大词典》又在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词典里不仅包括了政治、经济、科技、生活等各方面的词汇，甚至还能查到美国的常用俚语，这部精美的大词典当年作为礼物送给了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为中国争了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郑易里在北京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前身)做编审工作，主编《苏联农业科学》和《农业科学译报》等农业科技刊物，编辑审校了大量世界先进农业科技译文，把国外的最新农业技术和农业经济政策介绍到中国。随着世界信息事业发展，计算机开始进入中国，郑易里又开始了计算机中文处理的研究。早在1929年，23岁的郑易里就对祖国的方块文字产生了研究兴趣，他曾给上海《申报》投书，提出汉字六笔画(点、横、直、斜、弯、纽)说。在编辑《英华大词典》中文索引中，郑易里就正式采用了“六笔查字法”，即用数字1~6作为汉字6种基本笔画的代码的一种简易查字法，这种查字法为汉字人工检索闯出了一条新路。

20世纪70年代初，郑易里参加了国家组织的计算机中文处理的“748”工程，提出“笔画-字根-整字-词语”序列，这是中国第一个按字型特征编码的完整体系。1981年郑易里主持“汉字字型信息26键输入编码”研究课题，提出中文输入汉字字型编码的“字根说”，成为中国电脑汉字形码理论体系的奠基人。1987年他与女儿郑珑合作进行了“字根通用码”研究，1990年11月，这一研究通过了中国标准技术开发公司和中国专利技术转让公司的技术鉴定，并被命名为“郑码”。“郑码”系统建成后，成为了比《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汉语大字典》还要多的“大型汉字数据库”，1994年在第22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上“郑码”被授予金奖，1996年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联合向“郑码”颁发了全国科技信息优秀成果一等奖……

2002年4月，96岁的郑易里去世。早年就参与中国共产党活动，又大力促成中国第一次翻译出版《资本论》全译本，编出惠及万千学子的《英华大词典》，最终又奠定了中国电脑汉字形码理论体系，发明了“郑码”……这当中的工作，只要做到一项，都堪称“不朽”了，而郑易里全部做到了。应该说，云南籍优秀共产党员郑易里用将近百年的人生，书写了一部令人赞叹的人生传奇！

本报地址：昆明市新闻路337号 集团办：64143341 编委办：64141890 经委办：64166892 编辑出版中心：64141286 舆论监督中心：64145865 邮政编码：650032 广告许可证：滇工商广字第1号 零售每份二元 云南日报印务中心印刷